

现代性与激进空间的三种典型

邹诗鹏

摘要 在当代,金融已由传统的功能性和工具性的经济部门,扩张为支撑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激进的金融帝国。房地产已不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不动产”,而是支撑空间生产、金融衍生体系及其信用体系的“动产”,直接体现着土地与金融资本的紧张关系,因而是蕴含着高风险的激进的社会政治空间。而复杂性、事件性、时间的抽离、身体的改变、民粹化、风险以及危机等征候,则直接决定着网络空间的激进性质。

关键词 激进社会理论 金融帝国 房地产 网络空间

DOI:10.16240/j.cnki.1002-3976.2016.02.004

依福柯的判断,现代性乃当下的自我迷恋,理论的主题则从时间转向空间与身体,转向生命政治学。对于这一转变,利奥塔及一些文化理论标签化地称之为后现代转向,仿佛由此形成了一种叛逆并异质于现代性的后现代性。然而,从近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理论效应看,所谓后现代性依然只是现代性的补写,只是增加了现代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依然属于现代性的指涉范围。当下人们的自我迷恋,实表达为抽掉了时间的空间(及身体)的持续在场,且与上一世纪70年代理论界掀起的空间转向紧密关联,其本质是空间的激进化。关于空间转向的理论专家学者们已多有论述。在本文中,笔者打算简要分析激进空间的三种典型,即金融、房地产与网络。如此具体化的现代性研究,实际上要求实现有关现代性理论资源与基于现代性实践的想象力的综合。

一、金融的激进化与金融帝国

今日世界,金融已不只是经济的一个功能性的

和工具性的部门或领域,金融的激进化及其由金融衍生体系所形成的金融帝国,已经成为现代性的高度激进的空间。

传统的金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经济手段或功能,金融不外是货币实现自身的方式,金融不外是货币的延伸,金融资本也只是货币资本的体现。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货币即“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①。马克思还区分了货币的五大功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可见,在马克思那里,货币仍然只是衡量和评价经济的符号。概言之,马克思只是限于生产逻辑并在必要的交换及消费功能上评价金融,也没有像西美尔那样基于交换与消费看待金融,其有关“货币天然不是金银,而金银天然不是货币”的判断及其否定纸币是货币的观点,表明他对于符号交换的功能性定位,表明他还不能够在独立的货币——金融之间展开资本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5页。

的分析。在他那里,作为工具的金融本身并不是激进的。西美尔肯定了货币的交换功能,并视之作为一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结构或网络。他指出:“金钱自身无论在哪里都只能成为手段,这样,存在(Dasein)的内容就被安置在一个庞大的目的论关联中。在这种关联中,没有什么目标位居首位,也没有目标奉陪末座。因为金钱用残酷的客观性衡量一切事物,这样确定的价值尺度决定了事物之间的联结,产生了涉及一个由客观的和个人的生活内容编织在一起的网,连续不断地结合在一起,具有严格的因果性,在这些方面,它与符合自然规律的宇宙很类似。”^①西美尔的货币观,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都市生活类型,是“基于市场交换原则”的“客观精神与主观精神的统一”,在西美尔看来,“金钱促进了客观精神与主观精神之间双方面的关系,它对生活风格的重要意义,不但没有被这些事实否定,反而得到了强调,不但没有被驳倒,反而得到了证实”^②。可见,西美尔的货币观是生活型而非激进型,他并不是从经济交换与控制手段上去理解货币,更没有形成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金融资本概念。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希法亭首次系统论述了金融资本概念^③。在希法亭看来,随着卡特尔及托拉斯的出现,以及自由竞争阶段的消失,金融与产业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因此有必要将金融资本与银行资本区分开。希法亭所谓的金融资本乃产业资本、银行资本与货币资本的“三位一体”^④。且由于金融资本获得“最大的权力”,必然伴随着商业资本的“最严重的衰落”。希法亭指出:“银行的权力增加了,它变成了产业的创建者并最终成为了统治者;它还作为金融资本来掠夺产业利润,就像以前的古老的高利贷者以利息的形式掠夺农民的收益和地主的地租一样。”^⑤在希法亭看来,金融资本已经获得整个经济体系的集权功能,并构成了同商业资本的矛盾。他认为:“金融资本的发展使商业的意义在绝对上和相对上都下降了,它将曾经骄傲的商人变成了被金融资本垄断的产业的代理人。”^⑥按照希法亭的理路,金融资本的形成,正是现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实质,并突出表现为信用的透支。因为,“到期支付的承诺已经作为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被用在大量的交易中。如果有一个人不能到期支付,那么其他的人也可能会因此而无法到期支付,而由作为支

付手段来使用的货币所引起的债务链条就会断裂,某一点的滞销就可以蔓延至所有其他人,从而变成普遍性的滞销。因此,支付信用使得不同的生产部门相互依赖,创造了局部滞销转化为普遍滞销的条件”^⑦。

现代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大都映现了这一描述。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大致如此,但是金融帝国主义现象越来越明显。其一,金融资本当下越来越不依赖于产业资本,乃至成为高度自洽的“金融帝国”,尽管商业资本或货币资本的收益远低于金融资本,但随着金融资本的发力,必然带来商业资本与货币资本的增长。符号化的货币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均从属于巨大的且独立运作的金融体系,超支透支信用体系、金融衍生体系的膨胀、滥发货币,正是“金融帝国”的表现方式。其二,希法亭对金融危机的判断在当时是保守的,他认为危机“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有一个漫长的过程”^⑧。但在当今时代,这一过程变得很快,甚至于已经出现了“危机依赖”,危机的持续使得资本主义的自我修复机制愈来愈完善。希法亭有一个判断,金融资本导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进而通过“跨越资本主义”从而迈向“社会主义化”,但历史似乎长时间地停滞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看来,希法亭的“金融”还是传统的功能性的“金融”,与今日“金融帝国”中同产业有意区分开来的激进的“金融”还是有所不同。

在当代金融资本主义逻辑中,正是看起来功能性的金融形成了依靠社会信用以及消费欲望,并主要依赖于符号(有些还是象征性符号)的巨大的相对独立的交换空间。不仅金银的价格乃至价值由它来规定,整个经济发展也由它来调节或控制,而且其增殖与否越来越与产业无关,整个资本越来越多地受金融、而不是受产业控制,因而越来越印证了由皮

①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顾仁明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② 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第74页。

③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拉法格提出(1903),但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一书中进行了系统论述。

④ 希法亭:《金融资本》,李琼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

⑤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50页。

⑥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50~251页。

⑦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65~266页。

⑧ 希法亭:《金融资本》,第266页。

凯蒂所发现的资本收益率远大于经济增长率的现象；其实质是“金融帝国”的强大支撑作用，这是一个与所谓“实体经济”并置、等量齐观并且更优越且经常支配后者的激进空间。金融帝国是一个庞大的体系，除不同的货币及其交换体系，还有股票、期货、利率、金融衍生产品，以及房地产。这些产品可能是符号的，但却也是实体性的，换句话说，其是否“值钱”，已不取决于其在生产逻辑上的价值（一般等价物的价值或价格）。由此观之，它的激进性质不言而喻，在空间上，金融帝国已带有全球性，且超出民族国家，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在时间上，金融帝国带有典型的不确定性，并带来对实际存在的实体经济的冲击；在动力机制上，金融帝国与其说受信用的支配，倒不如说是受某种日益增长且不可遏止的欲望的支配，因而越来越表征为超出实体经济及其生产逻辑的欲望经济及其消费异化。2008年的金融危机，实为透支的金融衍生产品超出了实体经济范围而产生的，因而当然是金融空间激进化的结果。

二、土地的激进化

土地的激进化主要表现为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房地产也越来越成为激进的资本空间，并成为激进的空间生产的典型。依传统的概念，房地产本身并不从属于金融衍生产品，其原本就被称为“不动产”。所谓“不动产”，一是就其形态而言，二是就其市场稳定性及其可期待的利润而言。但是，就其实际参与甚至绑定金融帝国而言，房地产不仅属于、而且是支撑性的金融衍生产品。2008年金融危机的缘起，即由于金融业巨额支撑的高投入房地产业及其信贷危机，危机是激进的金融与房地产空间交互作用的结果。

就其本身而言，房地产仍是土地及居住空间的生产。但传统的土地并没有被激进化，古典资本主义的土地也一样，因而无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土地都没有成为激进空间，而只是以地租形式呈现出来，是同货币化、并同资本的本质要素分离开来的仅从属于不变资本的要素。“土地曾经属于一个战败的阶级的残余，属于地主，这是一个源于封建社会的阶级”^①。从农业到工业的空间转移，使得政治经济学传统对土地的依

赖不再那么敏感，仿佛土地只是资本扩张及产业开发的受动的资源。本来，传统社会的革命时代，土地是容易激进化的，传统革命的表现，多是剧烈的土地革命。无论古典时代的地租，还是现代的房租，都是一个自外于生产体系的概念。“租金取决于土地和土地所有者，然而，和土地的价格、利息、资本借贷者的利息无关”^②。如此一来租金及土地，显然失去了激进化的可能。工业革命仿佛以工商业及城市化化解了土地的激进化，取而代之的是劳资对立。马克思的分析理路即是如此。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们可以发现，原本探讨资本、地租、劳动三者的关系，其中，地租在经过地产化处理及分析之后被抽掉了，而资本、地租与劳动三者间的关系，也变成了劳动与资本的二元关系。在笔记本 I 中，马克思讲“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③。“地租”一节形成的结论，是大工业及其普遍的私有财产条件下，个别的地租普遍化，并形成地产。“地产这个私有财产根源必然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所有者的统治必然要失去一切政治色彩而表现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单纯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所有者和他的财产之间的一切人格的关系必然终止，而这个财产必然成为纯实物的、物质的财富；与土地的荣誉联姻必然被利益的联姻所代替，而土地也像人一样必然降到牟利价值的水平。地产的根源，即卑鄙的自私自利，也必然以其无耻的形式表现出来”^④。一旦将地产纳入私有财产，或看成是直接的资本，那么在资本、地租与劳动之间，地租即被抽象掉，三者的关系由此简化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而对工人而言，全部的问题在于其仅仅可供资本化的劳动，与包括地产化或资本化的地租在内的资本之间的矛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只是讨论了六大主题中的“资本”，而且还只是“一般资本”。试想如果真正以土地所有制为主题，马克思会如何展开分析，其实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

①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0 页。

②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 112 页。

③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 页。

④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 45 页。

追问。但是,无论如何,房地产作为激进空间,并不在马克思地租理论视野之内。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即明确地指出,地产乃是最能够代表长子继承制的私有财产,这表明他不太可能在工业化进程中理解高度商业化的地产,而现代商业意义上的房地产的兴起,本身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信贷业的形成相关联的,其越来越同金融系统捆绑在一起,并且本身就属于金融衍生产品,其激进性质可想而知。但马克思似乎没有能力想象房地产的激进化,在他那里,房地产仿佛只是属于农业文明时代的财产方式,而在其所关注的工业化以及资本主义时代,房地产不过是以地租(包括厂房租借)方式出现的,而且属于不变资本。

房地产的激进化,实是经济杠杆原理下土地与金融资本结合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房贷业的兴起,极大地刺激了西方房地产业的兴起及其房产价格的持续走高,也改变了人们尤其是城市群体的生产、消费与生活方式,迫不得已却又心甘情愿的“房奴”生涯,使得与现代性有关“用未来支付现在”的时间想象完全变成现实。但房地产业也越来越反映出现代性的高风险性,房地产越来越成为金融帝国及其金融衍生体系的支撑,直到高速发展的动产化的房地产业的泡沫被刺破为止。众所周知,2008年金融危机的实质即次贷危机,也即与金融资本及银行资本捆定在一起的房贷危机。

作为激进空间的房地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即前述资本化空间。房地产也许还可以称为“不动产”,但已不只是相对于货币、劳动等流动资本而言的“不动”,也不只是相对的价值或价格上的坚挺,而是意味着高投入高回报(也意味着高风险)。房地产已不只是人居空间,而是以人居及土地资源之稀缺为根由进而实现的资本化,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作为资本化空间,房地产的实质其实是“空间的动产化”^①。房地产显然使土地激进化,土地的稀缺,人口的膨胀及其人居焦虑,反过来推动房地产的激进化,即社会不断推高房价,尤其是货币化及城市化程度高的地方的房价,进而形成激进的社会政治空间。房地产并不只是经济空间,而是激进的社会政治空间,是在这一前提下的经济空间。

其二即所谓“空间生产”及其精神文化效应。房地产最直接地体现着“空间生产”。房地产的价格主

要源于土地的稀缺性。稀缺的土地当然是由资本化及城市化程度所决定的,由此也决定了稀缺土地的激进性质——其对资本的与日俱增的吸纳与持有。因为同样的原因,形成了空间生产。于是乎,大地上高楼林立、遍地造“城”,形成激进的城市化运动。既然不再以人居为限,而是从属于某种稀缺性的资产,“鬼城”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就空间生产而言,房地产作为激进空间,乃是其作为现代性的在场物对传统的离弃,房地产业的兴起,几乎总是以城市的固有风貌的破坏甚至损毁为代价的,伴随城市房地产业发展的必定是大规模的城市拆迁与空间生产运动。与传统建筑物的保守相比,房地产业总是呈现出激进的特征。

三、网络空间的激进化

在当代网络空间日益激进化。从广义上讲,今日整个社会趋向于网络化,趋向于网络化社会,“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②。“在网络社会的理想类型下所概述的社会转化过程,超越了生产的社会——技术关系领域;这些过程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化与权力。文化表现抽离了历史与地理,变成主要由电子传播网络中介与观众以多样化的符码和价值互动,而最终汇集于数字化的视听超文本中”^③。广义的网络社会本身就是激进空间,复杂性、风险、危机、事件性,时间的抽离与身体的改变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的特征。“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利用技术以逃脱其存在脉络,并且选择性地挪用每个脉络迄今可以提供的价值”^④。人们已然习惯于在时间中把握无意义,并因此形成了荒诞感,荒诞不外乎就是事件的无时间性,但网络空间中恰恰就充斥着无时间性的事件,或者说,网络化的“事件”在无时间性的延宕中延异、消耗;网络空间的如此荒诞已是司空见惯,“多众”对于网络空间中的无意义感同样也已经麻

① 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98页。

② 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34页。

③ 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439页。

④ 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第402页。

木,在很多情况下,网络化本身就是以牺牲个体的知觉为前提。

“无时间的时间”讲的当然是时间体验,是相对于传统时间体验而言的网络化时间体验。时下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有事总加班,没事总熬夜”,即形象地显示出网络化时间体验方式的变化。网络化的确带来了时间体验方式的巨大变化。时间都去哪儿啦?其实就在空间里,对于多众而言就是在一个又一个异质的、不连续的但又自身延异的空间里,网络空间的忙碌与绵延,替代了时间性的焦虑或荒诞,时间中的激进也转移为空间的激进。时间的流动,完全由一个又一个目不暇接且可无限增生的“空间”所代替,既然留下的是“无时间的时间”,自然也就没有了深度,随之而来的是常态化且易于打发的无聊与虚无。网络是一道深渊,其吸纳也制造多众,在那里,多众的生命时间被网络的无限个切面所分割和侵占,多众沉醉于网络,以至于已经抽掉了生命背后的时间之流,网络空间实质上加剧了后现代虚无主义的体验。

无疑,因特网这个所谓虚拟的网络空间已不再“虚拟”,而是实实在在的交往与生活空间,对于很多人或很多场合而言,因特网甚至比周围世界更加真实可感(只要想想地铁里人人摆弄着手机而全然漠视周围人群就够了)。因为巨大的聚集与传播效应,以及前所未有的个人显现程度(“人人都有麦克风”),激进已成为网络空间的本质特征。网络空间巨大而无限,其民主化特征十分鲜明,而网络化从客观上也正在“倒逼”且推动着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建设。但网络的个性化又不可避免地夹杂着喧嚣与躁动,夹杂着非理性且无法控制的冲动,因为网络空间的改变本身就连带着身体的激进化,处处似乎都在显示着“行动”的逻辑。事实上,因为多众、匿名隐身,易于表达及交流,激进的空间在形式及程度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社会运动呈现为新的形式。人人都可以成为世界的中心,人人都可以影响世界,而人人又都被世界所影响,网络空间的巨大集聚与传播效应,往往会使各种原本局部的、偶发的小事情变为网络大“事件”,且持续发酵。网络空间实是巨大的民粹化空间,伴随着信息爆炸的是意见的爆炸,各种意见相互汇聚、抓狂、攻击、拍砖,伴随着各种语言暴力。热闹的背后总是隐现着系统的不安全与脆弱。通常而言,民粹主义本质上是难以聚集的,但网

络民粹的聚集能力及时而超强,网络上的“事件”频频,吸人眼球,网络话语最易于泛滥和失控,网络显然越来越难以驾驭。而且,激进的网络同时也塑造着相应的网民及其价值观,进而改变网民的价值观及其认同,进而增加政府管理的压力与难度。看戏的不怕事大,但事再大又不是个事,久而久之,激进的网络实又形成某种麻痹,某种疲乏与无所谓。

网络空间的激进性,当然还是属于后现代的激进,即话语性质的而非实际行动的激进。网络空间的表演性愈来愈明显。网络生活毕竟具有虚拟性,如果说实际的政治生活空间中激进意识总是指向于激进行动,那么,网络空间的话语冲突很少诉诸实际的冲突,隔空对骂,硝烟弥漫,但还是口水战,是话语的极尽表演,甚至于严肃的政治也逐渐成为表演。网络事件多如牛毛,更迭频繁,各种激进的且异质性的“事件”接踵而至,你方唱罢我登场,事件的意义则在表演中消耗殆尽,如此离散的激进,足以冲掉传统时间与网络事件的那种同一性。因而,激进的网络事件并不容易,也并不必然引发实际的事件,在这个意义上,激进的网络空间本身也是大众心理驱使的结果,也必然受制于大众心理。就此而言,网络空间的激进性,不只表现在当下的行动态势,还表现为常态化的话语激进,话语的激进实际上陷入了民粹化的非理性主义。网络空间的激进同样也会导致政治冷漠主义,往往对公共政治的建构漠然视之,在严重的情况下引发政治认同的危机,至于网络伦理的残酷程度,更是前所未有的。网络是无数事件的“杂和体”,但同时也堆满了品种各异的“僵尸”。

网络化带来了一个空前的民粹主义时代,我们或可称之为网络民粹主义。但网络民粹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的民粹主义。传统的民粹主义,实际上不能称之为“主义”,民粹本身不太可能“主义”化,因而民粹+主义确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连接,因为民粹的空间实际上是狭窄的并且是压抑的,表达诉求的有限实际上也限制了民粹主义的政治空间。网络空间却是一个个自我可以无限放大的空间,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政治效应,因而,网络民粹主义已不再只是民间性的或单纯的无政府性质,而是作为一支具有强劲的实践参与性的社会政治力量。网络已完全超越了一般的技术与生活领域,并成为主要的社会政治空间。

(下转第 40 页)

现代性问题研究 29

我们所谓的“异化”、“人与自我的疏离”，是指人在自我意识的剧场假相中丧失本心、不明自性、不见本体。“人与自我的统一”把人与自然的交往（生产劳动）、人与他人的交往（社会关系）带到了人的“类本质”层面上，正是在人的“类生命”中，人在异在中才能同时是在自身中。“人与自我的统一”、“回到自身”是借助人与自然的交往、人与他人的交往的暗示所实现的“灵魂的回忆”，因此自主存在具有绝对性、无限性与永恒性品格。人在异在中就是在自身中，意味着人与他的对象交融互摄、相互包含，人在对象中的活动与对象在人中的活动是同一个自主活动，人与对象具足同一个人生命，共享绝对性的理想价值。而这一自主存在也涵摄其他一切可能存在，这种涵摄与辉映正是想像的无限性在现实规定的当下即是。

（上接第 29 页）

余 论

本文分析了三种典型的激进空间，可以看成是对激进空间的具体化或领域性的研究，这样的分析对于摆脱当下有关现代性研究过于宏大且往往大而化之的困境，是有一定意义的。但笔者显然无意于否定现代性的宏大研究的意义，也不是要由此限定激进空间类型。因为现代性的复杂与多变，激进空间同样难以细分。当年列斐伏尔在讨论空间生产时一口气列出了三十余种空间，诸如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具体空间、抽象空间、纯粹空间、社会空间、私人空间、共享空间、矛盾空间、文化空间、差别空间、主导空间、戏剧化空间、认识论空间、家族空间、工具空间、休闲空间、生活空间、创造性空间、物质空间、精神空间、自然空间、中性空间、有机空间、多重空间、政治空间、现实空间、压抑空间、感觉空间、女性空间、透明空间、真实空间、资本主义空间、社会主义空间以及国家空间^①。这些领域各异、彼此交织且层级不同的空间同时也是空间转向及空间激进化的产物，也都值得作具体的甚至是更加细致微观的分析。列斐伏尔关注到了当时的激进空间，但空间实践及其现代性本身仍在不断变化，因而理当关注今日现代性境况下的激进空间。在这一意义上，视金融、房

40 天津社会科学 2016 年第 2 期

马克思批判了意识形态的抽象的普遍性，主张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克服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分裂，实现想像对现实的否定性统一的自主活动。这正是倒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项目号：11AZD05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德意志意识形态》思想解析”（项目号：12JJD71000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杨 晓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讲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钟 河

地产与网络为激进空间之典型并展开分析，不仅不是、而恰恰是为了开放激进空间，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更为具体化，如此具体化的讨论愈多，对整个现代性的研究就应当愈加深化。当年马克思恰恰是通过资本研究这一具体化环节从而深化其历史科学研究的，这也是对我们展开具体的现代性研究的一个历史例证与理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项目“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若干重大理论动向及其评价”（项目号：2009JJD7200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社会科学院学科创新研究项目资助。

（本文作者：邹诗鹏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赵景来

^①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1, p. 154.